

# 从中英协议看中共的动向

王凡西

(1984年10月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九十年代》第180期，1985年1月出版，署名：惠泉。

## 一致赞赏的英国舆论

秘密谈判了两年的中英香港协议终于公布了。除了在台湾等极少数方面之外，它获得了一片喝采声。尤其在英国，它几乎是被当作外交上的一项胜利来庆祝的。外交大臣贺维称之为“非常的与革命性的协议”。《泰晤士报》九月二十七日的社论说：“英国人最出色地完成了一桩难办的工作。”《卫报》则用“齐声赞美迎协议”的标题来报导有关协议的消息。

不过最有意思的，我觉得是《卫报》社论在九月二十八日所发挥的见解。它从“较为宽广的历史考虑”来看此协议。社论回忆了三十年前日内瓦会议上的情形：当时美国的杜勒斯竟拒绝和周恩来握手。接着它又引述了一九八〇年列根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中国的话，说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政府的基本意识形态就是要消灭我们这样的政府”。

“可是现在”，《卫报》的社论接着说：“看看一九八四年吧，贺维爵士宣布在一个国家内，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能以独特方式来共存共荣。邓小平主任为此开了香槟。美国人点头赞赏。也许，列根先生卅年来所见的中国的性质已完全改变了。或者，也许是贺维爵士及其身边的那一群谋士们将于事后证明为受骗吧，或者，一九五四年西方世界（对中共）所作的判断根本是错的。当然，你不能十分肯定地选择其中某一个假设。但是杜勒斯如果尚在人间，他对贺维爵士的满怀希望的一揽子交易该怎么样？他大概会以嘲笑态度来狂吠乱叫的吧。可是现在，没有一个人对贺维爵士狂叫，连列根总统都不曾这样做，这是一种尺度，它衡量出一个最基本的观念能够改变得多么地远大与多么地快速。”

这样一种“历史考虑”是有益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尤其要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中英协议。

就协议本身谈中英双方的谁胜谁负，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真正的胜负不可能决定于协议的文字规定，而将取决于未来的真实斗争。倘单从静态方面看，即从字面的协定来说，胜利当然属于中国。它排除了“三个条约有效论”，排除了“以主权换取治权论”。协议的基本内容，全部是在中国方面规定的方针下与框框内进行讨论而最后确定了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当然不会成为“李鸿章第二”。

但是中国方面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显然不能归功于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有志之士与劳苦大众反对外族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进行斗争的结果；当然，更直接的，它是中国第三次革命（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胜利的结果。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使一直欺压中国劳苦大众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另眼相看，不得

不以平等态度来对待中国——这是中英协定所以能够达成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党派，更不谈任何一个人，要想把全部光荣归于一己，都是僭越的。

邓小平之所以能不成其为“李鸿章第二”，主要因为今天的中国不是李鸿章时代的中国。戴卓尔夫人之所以未能贯彻她的“三个条约有效论”，主要也因为目前的英国已不是帕麦斯东的英国了。

### 邓小平的让步与列宁的让步

不过我绝不想谈，目前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的路线与政策，与中英协议的达成无关。相反，我以为其间有甚大关系。

不妨这样说，如果不是邓小平及其一派的所谓“务实主义”路线当令，中英协议纵使达成，却一定不会这样“顺利”，不会这样皆大欢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主动作出了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重大让步，不提出所谓“一国两制”的办法，不提出“五十年内一切不变”等等有利于英国殖民主义继续存在，甚至有扩大希望的种种承诺，那末非常明显，一心想做大英帝国守护人的戴卓尔夫人一流，绝不肯答允香港的主权、治权交还给中国的。

然则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比较长远的意义上，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上，邓小平做成这笔中英交易，已成为“李鸿章第二”？

我们的回答是，目前还不能做肯定答复，它将在未来的斗争中决定。

我们绝无理由说中国一方所作的种种让步，其本身就已是民族利益的出卖，就已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变。只有最天真无知的人，或像台湾方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中国的外交绝不许应用任何策略，绝不该有任何让步。历史上任何一宗外交谈判都是策略上的斗智。历史上最革命的政权有如布尔什维克政府，也曾一再对帝国主义作出让步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中共对英国在协议中作了重大的让步，它主要在于中共领导人是以怎样的态度来作出这些让步，在于他们如何看待这些让步，更在于他们准备以怎样的方法和步骤来使这些让步对自己的事业不但无损而且有利。

大家知道，中共主动提出“一切不变”的最直接原因，乃是它卅五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在国内所实行的种种错误政策与官僚统治失尽了人心，致使香港人不愿接受它的统治，不愿见香港“回归祖国”。

中共答应香港人于收回香港后“一切不变”，事实上是中国承认它三十五年来统治中国的失败。事实上承认它在中国所搞的一套“社会主义”之不受欢迎，见不得人。

在这方面原本有许多话应该说，有很多教训可以得出来，但在这篇专谈中英香港协议的短文里，我只想以指出这个事实为限，不再多予发挥。

且让我们来看，邓小平等是以怎样的态度作此让步，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让步的。

列宁做过不少让步。无论对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的异己阶级。对外，与德国签订过布列斯特和约；对内，实行了“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不管是对外的屈服，或对内的妥协，列宁总是以真名称呼实物，宣布它们是不得已的让步，是形势所逼的退却；而这些让步与退却之所以必需，无论它是为了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对比一时处于绝对不利地位，或者为了前一时革命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不得不改变方法来加以补救，而其最大与最终目的，总是要使社会主义事业从让步中取得利益，由暂时的退却转为进攻。

历史证明了列宁等所做的屈服与退让确乎是必须的，是正确的，对俄国的革命事业来说，并未带来损害，而是带来好处；使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使工农联盟得以加强，使全国的经济生活得以活跃，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邓小平等所做的退让（无论在国内政策上或对外政策上，特别在香港问题上），是否也能让人看到当年列宁所表明的那种鲜明态度，那种确定方针与坚强一贯的革命性质呢？

没有，一点也没有！

### 还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吗？

它们让人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一些模棱两可的声明，一些圆滑的外交词令，更坏的，它们在另一方面，却非常明白与确定地昭告了中共愿与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实行妥协、甚至合作的决心！

因此，邓小平等今天对美、英帝国主义与国内外资本主义所作的屈服是真屈服，其所作的退让是真退让。

列宁当年的战略步骤是“以退为进”。今天邓小平等的战略路线则是“以退为退”，其方向就是要彻底退回到资本主义。

可是中共的新领导不是口口声声要“坚持社会主义”吗？我们指责邓小平想“彻底退回到资本主义”，不会是纯粹的诬控吗？

我们不曾说北京新当局已决心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不曾说他们已彻底抛弃社会主义的方针。为了改正毛泽东当权时代的种种“极左”的荒唐错误，为了弥补由那些错误所造成的一切损害，邓小平等五年来所采行的许多政策是合理、必需的，因而是正确的。作为负责的与积极的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者，我们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同时我们却必须提出，满怀不安与忧虑地提出，邓小平等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对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退让之上的种种改革，却大有让无止境，以致会有恢复整个资本主义的危险与可能。

当年列宁退向新经济政策时候态度是怎样的呢？与今天中共当局所采取的完全相反。他那种万分惊惕与高瞻远瞩的立场，充分表露他在那个时期的言论中，特别清楚地发挥在他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对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下面是其中一些最值得注意的段落：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就在很大程度上转到恢复资本主义。究

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同外国资本家订立的租赁合同……和私人资本家的租借，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都是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有关的。因为废除余粮征集制，就是准许农民自由出卖缴纳粮食税以后剩余的农产品，而粮食税只收去他们产品中的一小部分。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在整个经济中占绝大的比重，因此在这种自由贸易的土壤上，资本主义不会不成长起来。

“……从战略上看，根本问题在于谁能更快地利用这种形势。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无产阶级力求建设社会主义，而资本家则说：‘让我们回头吧，这样保险一些，不要再想什么社会主义了。’”

跟着，列宁便提出了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口号——“谁将取得胜利——谁战胜谁？”并且作了详细的说明。

今天邓小平他们是否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呢？显然没有。他们根本看不到目前的新形势中应该提出“谁战胜谁？”的问题。从他们的所言所行（特别是从他们的所行）来看，他们根本不以为今后中国（包括香港）存在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趋向与资本主义力量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只要能“搞活经济”，能造成繁荣昌盛，那就都算是成功，就都算是达到目的。他们根本不问这是怎样的活跃，是怎样的繁荣。他们根本不理在这种活跃与繁荣下面进行着怎样的阶级力量的分合。他们根本不理这些表面现象如何代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成分的消长。只要是活跃与繁荣，不管他们是由资本主义的“黑猫”带来，或者由社会主义的“白猫”带来，便都是好的。而且，目前已见到的活跃与繁荣既然都是因退回到资本主义而达成的，那末，这只“黑猫”便毫无疑问地被公认为“好猫”了。

### 毛泽东的脏水和社会主义的婴儿

今天中共的领导人便是这样地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这乃是目前局势中最大的危机。虽然他们仍然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口头上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然而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几无一不向西方看齐，无一不迎合资本主义。他们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他们内心里早已对资本主义认输。

“哀莫大于心死”。中共领导人以及全国广大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前途之失却信心（他们把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一套当成唯一可能的“社会主义”），对于美式资本主义的无限倾心（包括从可口可乐到时装选美的全套文明），实在是目前最令一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痛心的事。

所以会造成这样可悲的局面，毛泽东的荒唐政策无疑要负最大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与罪恶，并不能用来辩护邓小平等的全部“走资路线”。中共新领导在医治过去创伤名义下所进行的改革，正在超越其必要程度，正在大踏步走向相反的极端。为了倾倒毛泽东主义这盆脏水，他们可能把社会主义这个婴儿也倒掉了。

邓小平等这些当局者也许仍以为他们忠于社会主义，也许还以为他们正执行着列宁当年的退让路线，也许仍以为用资本主义方法来提高生产力，经过若干年后可以在更高的经济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但是，作为旁观者的帝国主义的战略家们却非常清醒，他们密切注视了多年来中共当局内政外交上的巨细改变，他们欢迎并助长一切于资本—帝国主义有

利的举措，他们甚至拼命要和中国的“务实派”结成联盟，反对一切“狂妄的”社会主义的倾向和力量。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另一方面则由于帝国主义者们的全球战略的利益——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积极的帮手，去反对全世界业已存在的社会主义势力，并扑灭正在蜂起的革命运动。

这次中英香港协议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达成，英国方面所以会作出如此的“让步”，我们首先必须从帝国主义的此一长期战略打算来寻找解答的。

从这一个意义来看，邓小平如果不曾成为“李鸿章第二”，却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香港乃至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罪人。

英国的《卫报》评论员显然不懂得大英帝国那些战略设计人的真正意图，也显然不清楚近五、六年来发生于中国的真情实况，以致天真地认为杜勒斯会对贺维爵士狂吠乱呼。杜勒斯地下有知，我相信他一定会对戴卓尔夫人与贺维爵士大加赞赏，赞他们的高瞻远瞩。他多半会相信，过了五十年之后，不但香港不会实行社会主义，而且相反，那时整个的中国可能已经香港化，亦即资本主义化了。

“谁战胜谁？”这个真正列宁主义的问题，帝国主义者是深深懂得的，可惜中国的新领导者却懵然不识，也许是故意装成不识。

今后香港与全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头等任务，就是要在必将来到的“一国两制”局面中，努力促成并保证社会主义力量去战胜资本主义。

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于英国